

# 第一章 客家与客家问题研究

## 一、话说客家

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支重要民系。它的先人原居我国北方。它有自己的方言，有自具特色的物质文化、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。这些结论，已经成为众多客家研究者的共同认识。

在研究客家民系的源流时，虽然有的学者说过“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一支”<sup>[1]</sup>，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客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居于汉民族之外的一个民族。长期以来，也曾有过客家“非汉种”<sup>[2]</sup>，或客家乃山地中“野蛮的部落，退化的人民”<sup>[3]</sup>，或者把客家视为少数民族等等说法。可是，问题一经提出，即有人指出其谬误，不能成立。<sup>[4]</sup>

但是，关于客家的源流，有些问题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，如：客家民系是南迁以后才逐步形成的，还是在北方早已存在的？它的形成，是单元一系，还是一系多元？对于前者，南迁形成说似已成为定论；对于后者，则论者尚有意见分歧。这些问题，尚有待我们共同加以讨论。

## 二、“客”从何来

首先要问：“客”从何来？

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：客家的先民原来生活在北方，主要在中原，其范围大致在今陕西、鲁西、晋南和鄂北的广大地区，即我们通称的中州大地。由于战乱或其他政治、经济等原因，从秦汉以后，尤其是西晋以后，客家的先民大量南移，跨黄河，渡长江，其中一支抵达江西、福建、广东三省交接的地区，与当地的畬族互为影响，终于形成了客家民系。其形成时间，早者说在五代时，晚者说在明末清初。

但是，从几个有关客家民系的根本问题考察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客家本来就存在于北方，是生活在北方的“土著”居民，汉民族中的一支民系，无所谓南迁以后才逐步形成的问题。只是在漫长的往南迁徙的过程中，客家人和百越诸族互相交流、互相影响和互相同化，有的转化为汉民族的其他民系或其他民族的成员，有的则在交流过程中影响和同化了别的民系或民族的居民，保留了客家人的本色，即今日遍布海内外的客家。

我们说客家本北方“土著”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。

因为客家来自北方的广大地区，辗转南迁，易地为“客”。为了不忘自己的根本，十分重视堂号；而堂号多以其先祖所居之郡地而来，是以堂号又常能反映其姓氏发祥或望出所在。且以我国几个大姓为例：李姓堂号“陇西”（秦置郡，在今甘肃陇西县）；陈姓堂号“颍川”（秦置郡，在今河南禹县）；<sup>[5]</sup>黄姓堂号“江夏”（汉置郡，在今湖北云梦县）；张姓堂号“清河”（汉置郡，在今河北清河县）；<sup>[6]</sup>刘姓堂号“彭城”（汉置郡，在今江苏徐州）。<sup>[7]</sup>各个姓氏的堂号（郡号、望地），以及与之相关的堂联，都可以说明他们的根基、“世泽”

与“家声”。而客家人的谱牒，更多地记载了他们的先祖自北南来的足迹。

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的标志，也最能反映客家传统文化与民系特色。据专家学者的考证，客家话是我国最古老、统一的语言，是“六朝之音”，亦有认为它即周语的。客家方言和汉民族其他民系的方言相比，它的词语、音韵与中州的词语、音韵具有更为深厚的因缘。温仲和纂《嘉应州志》卷七《方言》，列举客家方言称人、述事、说物词语及谚语近300条，皆可从古籍、古语及其古韵、古义中得到例证，说明“嘉应之话，多隋唐以前古音”；或云客家“语言多合中原之音韵，其说皆有所考据”<sup>[8]</sup>。章太炎撰《岭外三州语》，从温仲和的《嘉应州志·方言》和杨恭桓的《客家本字》所记嘉应州、惠州和潮州的客家方言中，选取单词或词组60余个，用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毛诗》、《老子》和《战国策》等经典加以对照、解释，论证了他对客家方言“雅训旧音往往而在”的认识，说明客家方言是保存了不少上古语音、词义的一种汉语方言。<sup>[9]</sup>广东和平县乌虎镇人徐旭增，清嘉庆己未（四年、1799年）进士。曾供职户部，奉派视察河工，稽查漕运赋务，官至汴、济、淮、徐各地。他在《丰湖杂记》中说：“客人语言，虽与内地各省小有不同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，故初离乡井，行经内地，随处都可相通。”<sup>[10]</sup>罗香林在《客家研究导论》第四章中，对客家方言的词类、音读、语法的调查、分析，以及它的源流、变革的辩证、考释，认为据此“可知客家与古代中原汉族之语言息息相通，于是客家为汉族嫡派以明”<sup>[11]</sup>。有的论者，更从江西、福建和广东的客家方言，举出不少实例，与古籍、古诗词相对照，得出了客家方言仍保留不少中原古韵的相同结论。<sup>[12]</sup>还有学者认为，在客家方言中，“含有许多古代雅言的成分”<sup>[13]</sup>。2003年，在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上，有来自中原的新闻记者论及客家方言时，仍有：“客家话，北方人至今听到的都有似懂非懂、似曾相识之感。原因是：客家先祖从中原迁至异地时，始终使用故乡的语言。‘宁卖田，不卖言’，千载之下，竟无改变。北京大学一位专门研究古汉语的教授走进客家后惊称，客家话是古代语言的活化石。”<sup>[14]</sup>以上所述足以表明：客家话这种“祖宗话”，是早在中原生活时已经具有，并同南迁而俱来的。

关于客家源流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，近年来有些香港、台湾等地的学者对客家先民南迁始于东晋的传统见解提出了异议。他们认为：“汉族中的客家人由中原大批南迁是始于秦。”自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11年）并吞六国，一统中原，“其中赵国人、魏国人是中原同一方言的强悍民族，他们战败并秦后”，民无驯服之心，秦有后患之虑，“于是发卒50万南征，移民南戍，开疆设郡。这些被强集的50万兵丁，大多是赵、魏的丁男丁女。……他们来自中原同一地区，说同一方言，一齐行动，一齐进占，一齐开基，披荆斩棘，发愤创业，这就是秦时中原人……开始南来，在各省边缘地带落地生根，作为现代客家人开基祖先的来龙去脉”。而征南军统帅屠睢及其部将任嚣、赵陀都是赵国人，则是“首次南迁的客家先锋队领袖”<sup>[15]</sup>。

类似的见解，早在 50 多年前广西就有人提出了，而且结合广西客家方言作了论证，指出：秦开岭南，辟南海、桂林、象郡，秦兵数十万戍其地，燕、赵、韩、魏之士从焉。而史禄出零陵，开灵渠，北人下漓水而入桂林。桂林汉为郁林郡。今贵县、兴业迤南之语言，必当时韩、魏之语音。“客语在他方或为厓（僂）语，以其自称曰厓，又谓之麻介语。介者，客语中之耆宿以为‘什物计’也。客语有所不知而问，必曰‘什物计’，（即‘集’，所谓‘拾没’）。语急并转为麻介问辞而云。‘什物计’者，谓就诸什物中计算之以告我。此亦秦汉以前中原之遗音也。”且以广西宾阳的客家语言为例，认为“宾阳语音介于隋唐之切音较近”。同时通过平、上、去三声的推敲比较，认为宾阳县境客语，即嘉应故州属之语，亦即先秦之燕赵语。<sup>[16]</sup>

再从客家南迁的历史进行考察。既然客家南迁的几次大潮出于战乱，则渡江逃难的途径不可能仅择一途。而历史文献和客观事实也证明，五代以前赣南、闽西、粤东之间通称“客家中心”以外的不少地区，也已有客家人迁入定居。另一种现象也不应忽视，即客家方言的共通性，直至今日，无论是国内的各个省区，或者是移居海外各地的客家人，所操的客家方言虽因地域关系在音调上可能小有差异，但使用的词语和语法等基本是相同的。用客家方言在客家人中相互交流，可以说是举国相通，天下皆通。自北南来既非一途，而语言却处处相通，说明只有南下之前语言已经同一，殊途南迁以后始能“天下皆通”。这种独特的社会生活现象，也就说明同操一种方言的客家民系，早已形成于中州大地，生活在河洛文化圈中了。

客家人的风俗习惯，亦多承传于历史。温仲和《嘉应州志》卷八《礼俗》，言及当地客家人之劳作、起居、饮食、衣着、婚嫁、丧葬、祭祀等礼仪、习俗，亦多古代遗风。嘉庆十三年(1808)，徐旭曾在惠州丰湖书院与学生谈论客家史说：他曾在“汴、济、淮、徐各地，见其乡村市集间，冠婚丧祭，年节往来之俗，常有与客人相同者，益信客人之先，来自中原之说为不诬也”<sup>[17]</sup>。张祖基等著《客家旧礼俗》，洋洋数 10 万言，对客家人的岁时、婚嫁、生育、丧葬诸礼俗，各种生活习惯，以及各种术数、鬼神迷信、自然与精灵崇拜等等，皆有论及；而其结论，则曰：来自“豫、鲁、晋、秦等地的客家人，才是所有客家人真正的老本家……其语音习尚，至今仍保持着他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”<sup>[18]</sup>。

回观客家民系形成于南迁以后的见解，论者虽多，但直至今日，到底形成于何时，具体形成的情况怎样，仍是人言言殊，尚无一致意见。虽然堂号（郡号、望地）、方言和风俗在探讨客家源流和民系形成时，都是大家关注的问题，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，可是，由于受到“顺势”思维的影响和传统观点的局限，使南迁而后形成民系说几成定论。如果我们以“逆势”思维对问题追本溯源，摆脱传统观点的影响，并把目光扩及所有的客家地区，考察各地客家迁徙的历史和现状，自会受到有益的启发，取得新的认识。

黄遵宪论客家人，曾有诗云：“筭路桃弧辗转迁，南来远过一千年；方言足证中原韵，



礼俗犹留三代前。”<sup>[19]</sup>正可作为我们上述三个方面的最好概括。客家的祖居老地在北方，南迁千百年，风习、语言仍是中原风韵，这种独特现象，不正说明客家民系早已生活在北方，无需经过南迁后才逐步形成了么？今日遍布中外各地的“客人”，实即当年华夏中州的“主人”。

### 三、客家：是单元一系，还是一系多元

再问：今天的客家民系，是来自单元一系，还是一系多元呢？

有的论者认为，客家人的祖先从中原迁来，“是纯粹的汉族”<sup>[20]</sup>，换言之，客家民系是单元一系的。

这种观点，值得商榷。

从理论上说，天地万事万物都是互为联系、发展变化的；所谓“纯粹”或不变，是暂时与相对的。具体说到客家民系，只要考察一下它自北向南迁徙的历史，就不难了解，它并非亦不可能是单元一系，而是一系多元的。

我们说客家民系来自北方，经历长期的辗转迁徙，仍保留自己的方言、风习与特性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。一是促成北人南迁的动因，主要是由于战乱和征调，如秦开岭南，汉征交趾，西晋的“八王之乱”，东晋时旧史所称的“五胡乱华”，唐中期的“安史之乱”，唐末年的黄巢起义，两宋时期的金、元南侵，以及明末的农民大起义，清兵南下，等等。其中宋、元之前的战乱，出现了北人南迁的大潮，而明、清以后，则多属客家人在江南各省的流动转徙。除了历代战乱、征调造成的迁徙、流动大潮之外，还有因仕宦、商贸、谋生以及喜爱南方水土而迁徙的涓涓细流。这种情况，在南迁客家和其他民系居民的谱牒中也有大量反映，值得我们注意。

另一个问题是，我们说北方人南迁，绝不是说历史上所有南迁者都是客家人。须知与之从北方南来的还有汉民族的其他民系或其他民族的成员。即令是南迁的客家人，由于在迁徙过程中各自的走向不同，居地各异，他们与南方百越各族居民的联系程度也多有差别。沿海的吴越、八闽、南唐、南越和内地的楚湘地区，曾分别出现过吴、越、八闽、南唐、南越和楚等政权，社会经济、文化比较发达。所以，客家民系或其他民系、民族的成员南来，进入这些地区，处于新来的“客”位，人数既少，政治、经济实力亦居于劣势。因此，自己原有的方言、风习与特性逐渐被淡化，进而被先入为“主”者所同化，其后裔很可能成了江浙人、福佬人、广府人、楚湘人或其他民族的人。而移居至皖南、赣东南、闽西、粤东、粤西、粤北、湘南以及桂东南等地的客家移民，由于这些地方处于腹地山区，地广人稀，风气闭塞，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也比较落后，这就有利于客家移民发展其物质的、精神的和谋生技能的优势，使他们有可能保留自己的方言、风习与特性，进而以自己的优势，影响直至同化周邻民族或民系的土著居民，处于后来居上的地位。在赣南、闽西、粤

东之间形成的客家中心及其与当地畬族的交流与影响，就是典型的事例。而于粤西、桂南，则有“钦（州）廉（州）客家始于五代”<sup>[21]</sup>之说。故宋人乐史撰《太平寰宇记》，说廉州“俗有四民，一曰客户”。到了南宋，钦州“五民”，其中之一即是“北来客人”。有宋一代，从桂东北至桂东南的不少州县，都有客家人从中原、江淮、闽浙各地迁入定居，至迟在南宋，客家方言已成为广西流行的五种方言之一。<sup>[22]</sup>由此可知，客家南来其走向的地域甚广，到达粤西、桂南的时间亦早。而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中，因与周邻其他民系或民族居民的交流、影响，天长地久，都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多元一系的，只是看谁在交流、影响过程中居于主体地位而已。

一个民族、一个民系如此，一个姓氏，虽曰同祖共宗，但由于不同时期、不同途径的多次迁徙，各走西东，在不同的地区与不同的民系、民族的居民发生接触、交流，日久年深，也必然发生分化。且以黄姓为例。据“黄氏谱牒”记载：黄峭，字献瑞，名实。生于宋太平兴国三年(978)，登祥符元年(1008)进士。“初官江夏太守……娶三妻……各生七子，共二十一子，八十三孙。因战乱纷纭，于嘉祐佑四年正月初二日（1059年2月16日）置酒邀亲友，召诸子训曰：‘余年已迈，将有九泉之处；人口繁衍，供给浩大，家业无多，何以为子孙长久之计？吾曾经过闽、粤等处，山环水秀，田地饶沃之所，指不胜屈。今将家业作二十一份均分，留长子侍奉，诸子分往各处，诚有孝心念我者，何异我在乎？有诗一首，登程执别。’”由是子孙散住江浙、豫章、岭南各州邑。后世黄氏“念诗符合，即属宗派”。<sup>[23]</sup>他们分居后的地区不同，一脉百派，也就出现了方言、风习、思想意识上的差异。黄姓如此，其他姓氏人口繁衍分流的结果，日子久远，也多有类似情况。

千百年来，客家民系的南迁及其在南方以外的繁衍、发展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、艰辛奋斗的历程，在和其他民系、民族的交流过程中，既有所分化，又常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丰富和壮大了自己。为了谋取生存与发展，他们还以自己的勇敢和机智，反抗强暴者的欺凌，抵制各种邪恶势力的侵扰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，在恶劣的环境中披荆斩棘，开基立业。艰难困苦铸就了客家人勤劳俭朴、勇敢刚毅、互助合群、敬宗崇本、爱国爱乡和开拓进取等积极精神；而居住地区长期和相对地处于半封闭状态，又养成了某些消极的性格。综而言之，客家人的千秋创业，用血泪与汗水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添加了多彩多姿的一页。

#### 四、关于客家研究

最后，谈谈有关客家研究的问题。

关于客家的历史，总的说来，还缺乏系统、翔实的记载，仅能从某些史籍与私家著述中零星拣得。19世纪中叶，即道光、咸丰、同治年间，土客的矛盾、斗争日益激烈，成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于是，客家民系及其历史才逐步引起中外人士的关注，启动了对客

家问题的研究。20世纪20年代以后，客家问题的研究出现了短暂的繁荣，出版了一批中外学者撰写的专著及论文，主要的如：20年代以前，杨桓的《客家本字》，章太炎的《岭外三州语》；20年代以后的有罗香林的《客家研究导论》，古直的《客家对》，山口县造的《客家与中国革命》等十部（篇）。1949年以后，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，大陆学者对客家的研究基本中止。而台湾、香港和国外学者却继续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。如：陈运栋的《客家人》，邓迅之的《客家源流研究》，雨青的《客家人寻“根”》，张祖基的《客家旧礼俗》等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客家研究重新成了大陆学者探讨的重要课题。福建、广东、江西、上海和北京等地的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与一些地区成立了客家研究的专门机构，并且加强了和港、台以及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，数十年的努力耕耘，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，并且把建立“客家学”提上了议程，令人感到振奋。

但是，回顾客家研究的已有的成果，毋庸讳言，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。

一是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客家的源流、迁徙、方言、歌谣、风习、居室、妇女、人物和民系特性等方面。这当然是必要的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对于有关省区客家人的历史与现状，他们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生活及其与周邻居民、民族的关系等等，则缺乏深入的实际调查研究。没有区域的、个案的研究，则整体的研究也难以深入与发展。

二是在以往的客家研究中，注意了文献资料的发掘、收集与征引。这当然也是必要的。但是，应该看到，人们的思想意识、生活状况也在不断地变化、前进，过去的文献资料并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，前人的记述也无法讲清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问题。因此，深入客家社会开展实地调查采访，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，应该摆到我们的工作议程中来。否则，研究的成果只能是陈陈相因，难有新意。

三是研究客家的目的在于了解过去，批判地继承客家历史文化的精华，使之为现实服务。因此，在研究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方法，全面、联系和发展地观察问题。土楼、围楼、围龙屋等居民建筑，虽然具有浓厚的客家传统文化特色，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，封建族权的崩溃，以及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更新，聚族而居已不可能。因此，它们也只能作为历史文物供人观赏与研究，无法也没有必要再予以发展。客家山歌虽然是客家文化的艺术珍品，至今仍是人们交流思想、抒发感情的重要艺术形式，但是，时至今日，我们不能为了弘扬客家文化，要求后生只唱客家山歌，不唱时代歌曲。社会在前进，客家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应该顺乎世界潮流、合乎人群需要而前进，如此才能生生不息，健康长寿。故步自封、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。

广西是客家人居住的重要省区之一。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地区实际的制约，广西客家和其他省份的客家既有许多共同的东西，又有自己的某些特点。据此对它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。由于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太少，基本处于空白状态，是以工作“无章可循”。而研究工程浩大，个人的力量难济于事，这就有待于集体的力量，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步

骤、分工合作去做，以期对广西客家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。  
愚意如此，未知朋友们以为然否？

- 
- [1] 参看罗香林《客家源流考》，4页。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影印本，1989。
- [2] 黄节：《广东乡土历史》。上海国学保存会，光绪三十一年。
- [3] 尔葛德：(R. P. Wolcott)《世界地理》(英文版)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0。
- [4] 请看《逸经》第三十期载王斤役：《福建云霄之瑶壮》。内有“瑶壮即今日之客族”说。《逸经》第二十四期载陈隆吉：《“瑶壮即今日之客族”说驳议》；第二十五期又有憾庐写的《客族、瑶壮、及闽南民族》参与讨论。
- [5] 亦有以汝南、下邳、广陵等为堂号的。
- [6] 亦有以南阳、中山、沛国等为堂号的。
- [7] 亦有以河间、弘农、东平等为堂号的。
- [8] 后引语见林达泉：《客说》。
- [9] 三州指嘉应州、潮州、惠州。该文作于1908年7月，附于《新方言》之后。
- [10] 广东和平《徐氏族谱》，见罗香林《客家史料汇编》，299页，1965(香港)。
- [11] 朱希祖：《客家研究导论·序》。
- [12] 郑民宽：《客家话中的古词语百例》，见饶任坤、卢斯飞主编：《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》，广西教育出版社，1993；山古布衣：《客家词汇保留着较多的中原古音》；李欣：《漫谈客家话》。俱见《客家》杂志，1994(3)。
- [13] 陈运栋：《客家人》，台北东门出版社，1988年第六版。
- [14] 《郑州晚报》编辑部：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特刊《望乡·叩开客家之门》。2003年10月，郑州。
- [15] 白桑摘自新加坡《客总通讯》赖雨桐的文章，转参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主办《岭南文史》，1991(4)《四海文萃·客家源流新说》。
- [16] 瞿富文修纂：《来宾县志》上编，《人民一·方言》，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。
- [17] 《丰湖杂记》，见广东和平《徐氏族谱》。
- [18] 高贤治主编《台湾风土集刊》之一种，1986年台北众文图书公司印行。
- [19] 《己亥杂诗》，见《入境庐诗草笺注》(中)。
- [20] 陈运栋：《客家人》，150页；邓迅之：《客家源流研究》，244页。台中市天明出版社，1982年。
- [21] 罗香林：《客家史料汇编》本编《族谱中之客家源流·温氏》。
- [22] 周去非：《岭外代答》卷三《五民》，卷四《方言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- [23] 参看《始兴黄氏五修族谱》、《蕉岭程官部黄氏族谱》，见罗香林：《客家史料汇编》本编《族谱中之客家源流》。香港九龙中国学社，1965。但《蕉岭程官部黄氏族谱》记黄峭“生五代间，戊寅正月十五日午时”。以之与科考中式和置酒邀亲友训子时间相较，又有不同。仅以此作为一系多元例证而已。